

信仰之海

李小均 著

The Sea of Faith

信仰之海

李小均 著

The Sea of Faith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仰之海/李小均 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9

ISBN 978 - 7 - 5495 - 2265 - 1

I. ①信… II. ①李… III. ①文艺评论-文集
IV. ①I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9654 号

出 品 人: 刘广汉

策 划: 魏 东

责任编辑: 魏 东

装帧设计: 赵 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 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31260822 - 882/88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 276017)

开本: 890mm × 1 240mm 1/32

印张: 9.5 字数: 180 千字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言

本书里的文字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关于诗歌，这得感谢恩师段景文教授，是在她当年的诗歌课上，埋下了这些文字的种子；二是关于翻译，因为稻梁谋的缘故，也就近水楼台，率先体会“误解作者，误告读者，是为译者”之讥；三是读书杂感，六年前南下，赶了次时髦，开通博客，闲时涂鸦，随手记下偶得一二，不成系统，此番辑录几则，算是为来时路留点印迹。

近十年来，“publish or perish”之风日浓。未能免俗，本书中一些文字当年为了“求生”，曾经拼命装得很“学术”，此次还其本真“散淡”面目。不过，依然感谢那些学术性刊物编辑的奖掖，拨出宝贵的版面，容纳这些不成气候的文字。

至于书名，十年前我就有心“占有”，也曾跟三五知交唠叨过。但每次总会暗地反悔，怕“玷污”了这个芳名。借出版之机，我想顺便说出我的“爱与怕”，也想对所有关爱我的人真诚说声谢谢，感谢你们无私的鼓励和帮助。特别要感谢魏东兄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诸君对本书的大力支持；感谢家人，尤其是 Fragrance，长年来默默的奉献。

目 录

黑暗走在光明后	1
永生的鸟啊,你不会死去	13
回望天堂的牧歌	22
诗人不幸诗名幸	31
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	43
疾病的隐喻	64
淋湿一生的鬼雨	75
暴力即景	86
翻译的暴力	100
翻译的政治	111
董桥的翻译	121
落伍的新潮	131
纳博科夫直译论的名与实	144

在三度语言空间逍遥的蝴蝶	152
思想与激情	158
失意的凯旋	169
科利奥兰纳斯之死	180
非洲的河湾	188
奥威尔与人类未来	204
有多少爱,经得起等待	217
自由,多少人假汝之名	222
失败的诸神	229
生活的智慧与智慧的生活	235
把我破成两半,再许个愿	239
在最黑暗的夜里看见彩虹	243
思想的纵欲者	248

心智与文采	251
斯坦纳的师承	256
千古文章未尽才	265
都是博学惹的祸	268
校园里有没有仰望星空的苏格拉底	272
刀和笔能刻出怎样的一段人生	275
春夜闭门读禁书	277
我的表骗我	280
弥尔顿四百年祭	283
仅此而已	290
代后记 信仰之海	294

黑暗走在光明后

—

“今夜大海宁静，/潮水正满，月色皎洁，/光照海峡。”(The sea is calm tonight./The tide is full, the moon lies fair/Upon the straits.) (L. 1-3)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的名诗《多佛海滩》(Dover Beach)以这非凡的气度开局，三言两语就定下了诗歌的时空与情感基调。修饰词“宁静”(calm)、“满”(full)和“皎洁”(fair)既是对事物“大海”、“潮水”与“月色”的客观描述，也是蜜月旅行中的诗人夫妇对未来安定、美满、光明的婚姻生活主观期望的投射。英语中两个“is”和一个“lies”出现，强化了诗人和读者对此情此景永恒存在的心理期盼。然而，时光的游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法兰西海岸的灯火/渐趋迷离，终至消隐；英格兰的悬崖耸立，/在宁静的海

湾里显出巨大的阴影。”(On the French coast the light/Gleams and is gone; the cliffs of England stand,/Glimmering and vast, out in the tranquil bay.)(L.3-5)“渐趋迷离,终至消隐”,写出了时光无情的流逝。这时光的流逝带走了光明,带来了“巨大的阴影”。但这外在的“阴影”并没有败坏诗人兴致。相反,他向新婚的妻子发出了共赏美景的邀请,“到窗前来吧,晚风如此甜蜜!”(Come to the window, sweet is the night air!)(L.6)“甜蜜”的“晚风”虽然证明了诗人的雅兴依然,但他的视野却难免受到“巨大的阴影”的局限。此时他已经无法分辨具体的景物,只能看见事物大体的轮廓:“月光漂白过的大陆,与大海相接处/唯见长长的浪花卷起。”(Only, from the long line of spray/Where the sea meets the moon-blanced land.)(L.7-8)在视觉受到影响的情况下,听觉的作用顿然凸显。“听!你听那磨牙的吼声/海浪卷走卵石,回头/又抛上高高的海滩,/涌起,停息,再涌起。”(Listen! You hear the grating roar/Of pebbles which the waves draw back, and fling,/At their return, up the high strand,/Begin, and cease, and then again begin.)(L.9-12)眼睛的功能是把注意力引向外在的事物,耳朵的功能却是把外在的声音引入内心,从而实现了注意力的内转,更利于沉思默想。阿诺德此时的凝神谛听,就听见大海“以颤动缓慢的节拍/送来千古悲鸣。”(With tremulous cadence slow, and bring/The eternal note of sadness in.)(L.13-14)“千古悲鸣”表明了诗人的情绪也有了巨大的翻转,这与本节中时间的流逝、注意力由视觉向听觉的转移有极大的关联。诗歌开头的一般现在时所允诺的永恒良辰美景顿成乌有。诗人也许突然顿悟,光明与黑暗的交替,潮水的涨落,月的阴晴圆缺,人的悲欢离合,皆是自然之律,难以违逆。

正是这“千古悲鸣”令百感交集的诗人想到了另一个时空中的索

福克勒斯,并从中找到了神秘的思想纽带。“索福克勒斯很久以前,/在爱琴海边听到这吼声,/心中想起人类的苦难/如潮汐涨落;我们/在此遥远的北海之滨聆听,/也听到了思想的声音。”(Sophocles long ago/Heard it on the Aegean, and it brought/Into his mind the turbid ebb and flow/Of human misery; we/Find also in the sound a thought,/Hearing it by this distant northern sea.)(L. 15-20)时空的距离没有把诗人和古希腊的哲人分隔在两个世界,相反,对“人类的苦难”的持续关注,却瓦解了时空的距离。然而,并非人人都会谛听,也许只有阿诺德这样仔细的“聆听”者,才会有此福分,听到“思想的声音”,从而反证了希腊精神已经遭到时人的遗弃。遭人遗弃的不仅有希腊精神,还有作为“信仰之海”的希伯来精神。“信仰之海,/也一度满溢,好似灿烂的腰带,/把世界的海岸缠绕。/但如今,我只听到/它落潮悠长的哀号,/伴随晚风的呼吸,撤退。”(The sea of Faith/Was once, too, at the full, and round earth's shore/Lay like the folds of-a bright girdle furled./But now I only hear/Its melancholy, long, withdrawing roar,/retreating, to the breath/Of the night wind...)(L. 21-27)诗句“*Its melancholy, long, withdrawing roar*”从声音、形象和意义上都充分展示出“信仰之海”“落潮悠长的哀号”,从而在读者的心中引发出无尽感慨和绵绵哀伤。尤其是当“信仰之海”退潮之后,“只留下世界广阔阴沉的边界/和无数裸露的沙石”(… down the vast edges drear/And naked shingles of the world)(L. 27-28),这样的感慨和哀伤将变得更加尖锐和深沉。在这两节诗歌里面,阿诺德试图表明,遗弃了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的现代世界,实质上就是一个荒原世界。

诗人通过回返自己的内心世界,洞察到了世界的表象和实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眼前的世界/虽然看似梦乡,/五彩缤纷、瑰

丽新奇,/其实没有欢乐,没有爱情,没有光明,/没有坚贞,没有和平,没有对痛苦的援助。”(… For the world, which seems/To lie before us like a land of dreams,/So various, so beautiful, so new,/Hath really neither joy, nor love, nor light,/Nor certitude, nor peace, nor help for pain.)(L. 30-34)第31行诗中的“To lie”既是“存在”,也是“撒谎”,点破了“表象”与“实质”之间的张力。“我们仿佛置身于黑暗的旷野,/无知的军队在黑夜中交锋,/混乱、挣扎、逃逸、惶恐。”(And we are here as on a darkling plain,/Swept with confused alarms of struggle and flight,/Where ignorant armies clash by night.)(L. 35-37)在这“黑暗的旷野”,诗人唯有求助于爱,向他的妻子发出了吁请:“啊,我的爱,愿我们/彼此忠诚!”(Ah, love, let us be true/To one another!)(L. 29-30)只有“真”(true)“爱”(love)才能拯救这个充满“谎言”(lies)的世界。

二

论诗才、诗歌的总体质量和数量,阿诺德都要比同时代的大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和勃朗宁(Robert Browning, 1806—1861)稍逊一筹。但就单篇的名气和影响而言,《多佛海滩》恐怕就要力压群芳。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诗歌中,《多佛海滩》之所以如此引人瞩目,为人传诵,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诗作本身在观念和气质上的现代性。

《多佛海滩》自发表以来,许多诗人对其主题都进行了各具特色的回应,绵延至今,未曾断绝。如果能够梳理“多佛海滩”引起的“余

波”，那将是一篇更长论文的范畴。在此，我只想举出，现代主义诗坛的两大巨匠——叶芝（W. B. Yeats, 1865—1939）和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都在自己的诗歌中对阿诺德的洞见发出了呼应，足证《多佛海滩》的深远影响。

我们已经看到，在《多佛海滩》中，阿诺德穿透世界的表象，直抵其真相，“我们仿佛置身于黑暗的旷野，/无知的军队在黑夜中交锋，/混乱、挣扎、逃逸、惶恐”。对这一世界的认知，我们在叶芝的名作《二次圣临》（The Second Coming）中不难发现阿诺德的声音：“万物崩溃，中心难再凝聚，/世界动荡无序，/血污潮水横溢，/纯真礼法湮没，/精英信念丧失，/群氓激情似火。”（Things fall apart, the center cannot hold; / Mere anarchy is loosed upon the world, / The blood-dimmed tide is loosed, and everywhere / The ceremony of innocence is drowned; / The best lack all conviction, while the worst / Are full of passionate intensity.）同样，对于阿诺德描述的“信仰之海”退潮之海，“只留下世界广阔阴沉的边界/和无数裸露的沙石”这一“荒原”景象，艾略特用了更为详尽的篇幅进行铺陈：“这紧紧缠绕着的是什么根啊？从这/石堆能长出什么枝叶？人子啊，/你说不清，也猜不透，因为你只知道/一堆破碎的偶像，烈日在那里炙烤，/枯树下没有阴凉，蟋蟀也不歌唱，/干燥的石头没有水声。只有/这红色的岩石投下的阴影。”（What are the roots that clutch, what branches grow / Out of this stony rubbish? Son of man, / You can't say, or guess, for you know only / A heap of broken images, where the sun beats, / And the dead tree gives no shelter, the cricket no relief, / And the dry stone no sound of water. Only / There is shadow of this red rock. . . .）

然而，如果说叶芝“万物崩溃，中心难再凝聚”的印象和艾略特对

“荒原”(Waste Land)世界的尽情书写都主要根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历史事实,那么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的阿诺德,在表面一片风平浪静、欣欣向荣的时代,又是如何具有先见之明,洞察到这一世界精神荒芜的真相?如果没有过人的眼光和清晰的判断,相信很难做到。而阿诺德正是借此走在了时代思想的前列,对时代的病症发出了自己尖锐的批判之声。

1822年,阿诺德出生名门。其父是著名的教育家、罗马史学者。阿诺德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求学时期的阿诺德并未有过人的表现,倒是有纨绔子弟的风范。直到27岁那一年出版第一部诗集《迷路的狂欢》,才让熟悉他的人们刮目相看,原来他深邃的思想一直隐藏在纨绔子弟的面具背后。两年过后,也就是1851年,阿诺德结婚成家,生活稳定下来。为了养家糊口,他在教育调查委员会谋到一个巡视员的差事,一干就是35年。这尽管是个苦差,但却给他带来了意外的补偿。长时间扎根基层,他对维多利亚社会的实际情况有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同时,他利用出国考察的机会,对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了深入的理解。正是这种深厚的本土经验和开阔的国际视野,成就了阿诺德维多利亚评论界“定音鼓”的地位。

阿诺德的声名首先来自他的诗歌。他的诗歌数量虽然不多,但成就卓著,1857年,他还被遴选为牛津大学的诗歌讲座教授,直至1867年荣休。尽管如此,阿诺德的兴趣早在50年代中期就发生了转向。一方面也许是公务缠身,无法专心创作;但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他认为自己的作品色调阴郁,“有无法排遣的病态郁结,不能像从前的诗歌一样激活人们、给苦恼的人生带来愉快,不符合心目中的好诗”,因此改弦易辙,转向他途。他先后转战于散文创作、

文学批评、社会批评、政治批评、宗教批评和教育批评等多个领域，并且在每个领域里都硕果累累、“罕逢对手”。他完全是“文艺复兴”时期所期待的“百科全书式人物”之典范，正如今日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恰如其分的评价，阿诺德无疑代表了“维多利亚最后一代文化伟人——既非学人亦非以文谋利者，而是穿越诗歌、批评、期刊杂志和社会评论之间，可以说是一种发自公众领域内部的声音。……与柯尔律治、卡莱尔和罗斯金等人一样，阿诺德表现出知识分子的两大古典标志，而与学术知识分子形成对照：他拒绝被绑缚在单一的话语领域内，他寻求使思想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在力图达到全面综合的视域方面……他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三

阿诺德毕生的心血“都可以落实到广义的教育和转变人的内心这个问题上”，他的诗歌也不例外。《多佛海滩》创作于1951年。那一年夏，阿诺德携新婚妻子到多佛海滩度蜜月，触景生情，写下了这一首美丽而又忧伤的诗作。但令人奇怪的是，他没有将此诗收录于1852、1853和1854出版的三本诗集，而是过了十余年，才收入1867年出版的最后一部诗集。而1867年正是阿诺德写其最著名的批评论著《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的关键时期。这两件事情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表明诗歌与批评有着内在一致的关联，也就是说，无论诗歌还是政治与社会批评，都在服务于“广义的教育和转变人的内心”这个核心问题。基于此，利用《文

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的观点对《多佛海滩》这首诗歌进行烛照，也许不无教益。

在《多佛海滩》的结尾，阿诺德写道，“无知的军队在黑夜中交锋”。这些“无知的军队”（ignorant armies）是什么？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这本书中，我们也许能够找到答案。阿诺德看见英国阶级之间的矛盾日渐激化。他认为，英国已经出现了三大阶级：贵族阶级、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但他并不满意这样的称谓，而是另选了三个独特的词汇来分别指称，即野蛮人（Barbarians）、非利士人（Philistines）和群氓（Populace）。野蛮人优点卓著，曾经为元气丧失的欧洲注入新的活力，带来了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和张扬个性的自由激情，他们的文化“主要是外在的文化，主要体现为外部的禀赋和魅力，如相貌、举止、才艺和勇武等”，当然也包括一些内在的禀赋，如“勇敢、高傲和自信等”，只不过这些特征是“内在禀赋中最浅表、最接近外在禀赋的品质”，总之，野蛮人的文化主要由“外部的魅力和造诣，以及浅表层的内在美德”构成，美中不足的是“缺乏足够的理智之光”。阿诺德之所以用“非利士人”指市侩的英国中产阶级，主要是因为这个阶级追求的只是“普通的自我，而不是最优秀的自我”，他们“只想工具手段，满脑子转的念头都是发展工业、执掌权力、成就卓著，还有别的能耐等等，心目中没有内在完美的地位”，整个心思都用于“有关自身的事物，而不是真正的自我，用于有关国家的事物而不是国家本身”，从而成为“光明之子的敌人，或反对侍奉思想的人”。群氓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组成部分随着自身权利意识的苏醒和维权意识的提高，开始采取游行、集会等手段，这些人数众多的社会底层，在阿诺德这样的社会精英眼中，自然成为了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根源之一。阿诺德意识到，随着野蛮人、非利士人和群氓三种势力的此消

彼长,社会局势也将随之起起落落。

《多佛海滩》结尾处传达出来的“无政府”状态正是阿诺德最担心的问题所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阿诺德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树立“国家的权威”。要树立“国家的权威”,“出路看来就是文化;文化不仅能通向完美,甚至只有通过文化我们才会有太平”。文化与国家的关系在于,“文化明白自己所要确立的,是国家,是集体的最优秀的自我,是民族的健全理智。良知作证,文化要树立国家的观念,不仅是为了维护秩序,也同样为了实现所需要的伟大变革”。阿诺德认为,人心的涣散,凝聚力的缺乏,国家威权的丧失,无政府状态的渐渐漫溢,从根源上而言,都是文化衰落的病象。

阿诺德所言的“文化”是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类一切“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这样的文化需要通过“阅读、观察和思考”等手段获取,从而使“我们能做到尽可能接近事物之坚实的可知规律,使我们的行动有根基,不至于那么混乱,使我们能达到比现在更全面的完美境界”。在阿诺德看来,西方文化的精华正在于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多佛海滩》中的索福克勒斯是希腊精神的化身,而基督教的“信仰之海”正是希伯来精神的具现。如今,很少有人还能谛听到索福克勒斯的声音,很少有人注意到“信仰之海”的退潮,足以证明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在现代的缺失。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阿诺德专章阐述了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需要完满结合的典范意义:“这两大精神准绳,一个注重智慧,另一个注重顺服;一个强调全面透彻地了解人的职责的由来依据,另一个则力主勤勉地履行职责;一个慎之又慎,确保不将黑暗当成光明,另一个则是看到大的亮光就奋力向前。”两种精神的路径虽然不同,但目标一致,那就是“人类的完美与救赎”。这两种精神的完美结合,正是“知”(knowing)与

“行”(acting)的融合。

阿诺德认为,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的正统地位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已经被清教主义取代。尽管后来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论述了新教伦理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贡献,但阿诺德的判断却是“清教主义不再是世界进步的主流,而只是斜里插入、阻挡主流的支流”。受到清教思想濡染的社会大众,尤其是一些社会中坚,只管埋头苦干,只管拉车不问路,只讲实践出真知,他们的错误就在于知行分离,主次颠倒,这种违背自然法则的做法必将引起麻烦和混乱,就像“无知的军队在黑夜中交锋,/混乱、挣扎、逃逸、惶恐”。

四

阿诺德生活的时期是维多利亚时代最美好的时光。英国已经开始称霸世界,“日不落帝国”的框架已经构成。在一个日新月异的变革时代,民族的激情与豪情都直冲云霄。阿诺德没有加入这样的“盛世”大合唱,却在一边泼冷水,写下如此让人不寒而栗的诗句,“这眼前的世界/虽然看似梦乡,/五彩缤纷、瑰丽新奇,/其实没有欢乐,没有爱情,没有光明,/没有坚贞,没有和平,没有对痛苦的援助”,实在是大煞风景,不合时宜。

阿诺德尖锐的批判之声也的确被他维多利亚时代的同胞所忽视。文化的栽培讲究慢工夫,更何况是要放下大不列颠帝国的架子,去学习其他那些大小不同文明的文化,这是当时务时、心高的英国社会所难于接受的,因此他被指责为“不懂实际,超验主义,不着边